



1894 年春夏间,孙中山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,途经上海,在此结识了宋耀如。他们“初谈革命”,开始了既是同志又是翁婿的时代。

为什么说是 1894 年呢?

我们还是要重复孙中山 1912 年 4 月的《致李晓生函》:“宋君嘉树者,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。二十年来始终不变,然不求知于世,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,此公不无力。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,而隐则传革命之道,是亦世之隐君子也。弟今解职来上海,得再见故人,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。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,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。”

陆皓东是 1895 年牺牲的,孙中山见到宋耀如,不禁有所感慨,藉以追思他们近二十年前的“屡作终夕谈”之往事。这也是人世间常情。

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这段评价,受到后人较多的关注,也做出不同解读。

唐玲玲、周伟民在《从罗刚编著<中华民国国父实录>》看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》(2009 年)中的这个看法,显示了严谨治学者的真知灼见:“这段记载十分重要,孙中山对宋耀如的评价,十分确切,显示了宋耀如高尚的人格魅力。从 1894 年至 1912 年共 18 年,这里孙中山说的二十年,是个概数。孙中山与宋耀如的革命情谊,前后 20 年始终不变。宋耀如为革命事业倾囊相助,‘上海革命得如此好结果,此公不无力。’这是赞扬他对革命事业的极大贡献。更可贵的是,孙中山指出宋耀如‘从事于教会及实业,而隐则传革命之道,是亦世之隐君子也’。诚如是言,‘世之隐君子’是孙中山给予宋耀如的崇高评价。宋耀如倾全部的身家财产贡献于孙中山革命事业,不为名,不求利,默默无闻,连革命史书上也很少看到宋耀如的名字,与当时一些争名夺利的势利之徒相比较,实乃云泥之别。”

而王乐德在所编著的《宋庆龄母系倪氏暨父系宋(韩)氏家谱》(2004 年)中的这种看法也是很有道理的:“二十年始终不变”是何含义?第一是说宋嘉树不改“二十年前”“初谈革命”的初衷,在从事教会和实业的工作中,坚持“隐则传革命之道”;第二是说宋停留在“隐则传革命之道”,这种“谈革命”的层面上,未能参加武装起义等革命行动,是位“从事于教会及实业”的人士。

但是,也正因为宋系革命的“隐君子”,隐伏在革命的后台,所以在孙中山革命的公开记录上,有关他的革命事迹记载不多,为后世历史研究者留下了求证的艰难。

回到孙中山所说的这个“二十年”,我们现在就是要当作是一个时间概数,而非时间限定语来看待。千万不要由此机械地推论孙宋相识于 1892 年。

这除了有其它的史料“旁证”之外,还因为这是私人信函,不必拘泥于具体的叙事时间。李晓生(1888-1970 年),广东番禺人。1906 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。1910 年赴英。1911 年 10 月武昌辛亥革命成功,时在伦敦的李代孙处理函电。随后孙邀其一起回国。孙中山 1912 年 1 月 1 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时,李任总统府秘书。

再者,写此函时孙中山刚解临时大总统职(4 月 1 日),让位于袁世凯,是在野之身,所以自称“弟今解职来上海,得再见故人”,由是忆起一段陈年往事,如是哪有必要顾及他们初次认识的具体的年份?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,孙在写此函时只是模糊地记得与宋认识是“二十年前”的事,至于具体是哪一年,他恐怕一时也未能记得。

此外,1912 年距 1894 年是 19 个年头,怎么“二十年前”就不能理解为一个约数?所谓“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下,不应作为约数来解读”,可是我们偏偏能找到不少这方面的资料来加以佐证。

在我们看到的“其他资料可以证明”孙宋初次认识于 1894 年的材料中,冯自由的记载

认识孙中山为什么说是在 1894 年?

文 / 钟一

是最重要可信的。

冯自由是谁?他是兴中会成员中“最年幼者”,有“革命童子”之称。冯自由字建华,原名懋隆,后改名自由。广东南海人。1882 生于日本长崎一个侨家庭。1895 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兴中会支部时,其父冯镜如为长崎支部负责人,冯自由也随父宣誓入会,时年 14 岁,为年龄最小的会员。冯自由曾经自喻:民国前八九年(1904、1903 年)革命轶事,除了他和刘成禺二人外,“无人知其详”。所著《革命逸史》是他根据香港《中国日报》及自己多年笔记、往来书信等编写的,记载的都是“最有根据及最有价值之正史材料”,因而该书被史学界认为是颇有参考价值的第一手史料。这都说明,冯自由是兴中会时代的见证者,所记述是真实可信的。

冯自由在所著《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》(《革命逸史》第三集)中记载说:“宋嘉树,号跃如,总理于甲午冬北上过上海时识之,即宋子文之父。”甲午年即 1894 年,可见孙中山是这年结识宋耀如于上海,并由此开始他们的革命事业。但文中的“冬”当是笔误,孙是在是年的春间前往上海的。

对此,冯自由在所著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(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)中,又在“革命运动第八年甲午(民国纪元前十八年 清光绪二十年 阳历一八九四年)”条目下记载:“至甲午春,遂偕陆皓东买舟北上。……既抵沪,暂寓三洋泾桥名利客栈。……时总理复结识陈廷威、宋耀如二人。廷威为水师将弁,由官应介绍相识。乙未(民前十七年)曾应总理招,回粤参加义举。耀如字嘉樹,粤之琼州人,为耶教传道士。”

作者在此用“结识”两字,颇见忠实于历史的用心。表明此时“刚走向社会”的孙文,与已经在上海滩“抗战八年”(从 1886 年 1 月开始)的宋耀如,身份地位的不相同。

就凭冯自由著《革命逸史》和《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》中的这些记载,就用不着我们去“考辨”孙宋是相识于什么时间了。

还有,陈少白著《兴中会革命史别录》,中有《陈廷威之略史》云:“甲午年在沪,由郑官应介绍结识孙先生”,即郑官(观)应介绍陈廷威认识孙中山。这也是旁证孙宋认识于 1894 年。

当然,我们还可以找其它资料来“旁证”。

吴相湘(1912-2007 年),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,著名历史学家。他“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”,引用英国、日本外交档案写成《孙逸仙先生传》(1984 年)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:“一八九四年春,孙先生北行到上海时,与宋耀如相遇。宋是在上海的中国人中第一位聆听孙先生革命观念的。因两人背景至少有五项相同:(一)出生于同一年,中国人所谓同庚。(二)同为广东省籍。(三)少年时都远赴海外,先习商,后求学。(四)都信仰基督教,且志愿为传教工作。(五)海外感受,目睹西人进步,国人故步自封,都有革新祖国宏愿。加以由上述孙宋两人都具有强烈民族与个人自尊心及独立奋斗精神,故两人一见如故。宋完全赞同孙的见解,愿以余生尽力协助孙完成建设新中国志愿。从此成为孙先生革命运动的热心支持者。”

因为孙宋两人有太多相似的背景,是以能在上海“一见如故”,这说的是实情;而不是如“考辨”者说,连两人认识也要有时、地利、人和的“思想基础”。当然,吴说孙生于同一年(1866 年),也是一种说法而已;我们已经知道,在《韩氏族谱》的记载中,宋耀如是生于 1861 年。

斯特林·西格雷夫,美国著名作家。他耗费十几年的心血,完成了产生很大影响的著作《宋家王朝》(1985 年)。该书从辛亥革命前宋耀如的发家写起,直至 1975 年蒋介石去世,宋美龄移居美国和宋庆龄 1981 年逝世为止,历时百余年。对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材料。对此书的价值,黄亚平、宋时娟在《宋耀如、倪珪贞生平史实若干问题辨析》(2009 年)中谈到这样的看法:在宋耀如和宋家早期的史料非常缺乏的情况下,《宋家王朝》等著作,给我们认识宋耀如、研究宋耀如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和书信等重要的历史资料。

《宋家王朝》(1985 年)中,同样写到宋孙 1894 年认识于上海:“一八九四年,宋查理遇到了秘密社团里的一位兄弟,此人后来成了他的至亲挚友,并且使他变成了革命者和逃亡者。他们的名字在从事历史上一项重大密谋活动的过程中,被婚姻和神话的纽带永远联结在一起。他们一道迷惑满人,使满清帝国濒于崩溃,一推即垮。”“此人姓孙名文。作为暴动的煽动者,他受到满清密探的追捕,因此用过许多化名。但是,为全世界所熟悉的一个名字是孙逸仙。他在早年受到异化教育,抱负弥坚。”“一八九四年初,孙北上,以便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的主张。他途经上海时遇见了一位三合会会友,名叫宋查理。”

孙宋不但相识于上海,而且是在教堂之中。这也是《宋家王朝》(1985 年)中所写:“孙和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,是在星期日做礼拜之后经人介绍而认识的。孙一生里经常到教堂里去寻觅新成员。他常爱说:‘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,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。’”

罗刚编著的《中华民国国父实录》(1988 年)同样记载说:“当孙中山本年初至沪,遇之与谈革命,耀如赞同国父之见解,愿尽力协助。”文中说的“本年”是 1894 年。

台湾“国立国父纪念馆”出版的《追随国父革命群英小传》(1999 年),当中的“宋嘉树传”写道:“甲午年夏,国父偕陆皓东北上,途经上海,与之相识,初谈革命,志同道合,支持革命事业,其后贡献良多。国父对其从事传教及实业,而隐则传革命之道,暗中印行宣传刊物,甘冒生命危险而始终不渝,誉为‘世之隐君子’也。”

庄政在《孙中山的大学生涯》(1995 年)中的这段议论,即使做为孙宋相识历史的小结也是很合适的:“相传一八九二年间,他已结识孙中山先生,果如斯,他俩很可能是在广州或香港见面的。他是国内最早闻其宣传反清革命的少数人之一。比较可靠而普遍的说法:一八九四年春,中山先生为求国富民强,渴望当道接纳他的改革之道,爰撰《上李鸿章书》,痛陈救国大计。偕陆皓东北上,途经上海,经陆介绍,结识宋嘉树。宋对孙甚表支持与敬重,早闻其人宣传革命道理,心仪已久,此番相晤,彼此畅谈素愿,志趣相投,宋愿鼎力相助。”

至此,在如此之多的史料复合佐证之下,孙宋 1894 年首次认识于上海,或者说“初谈革命”于上海,这还用得着去怀疑或“考辨”否?

当然,孙宋“初谈革命”之革命,自有一番含义。此时的“革命”其实是造反的同义语,他们谈论的是反满复汉事业。直到 1895 年广州起义失败,孙中山等流亡日本时才从神户出版的报纸上得到启发,“革命”二字始为党人所沿用。



冯自由在《革命二字之由来》(《革命逸史初集》)中,这样解释说:“在清季乙未(1895)年兴中会失败以前,中国革命党人向未采用‘革命’二字为名称。从太平天国以至兴中会,党人均沿用‘造反’或‘起义’‘光复’等名辞。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,孙总理、陈少白、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,舟过神户时,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,中有新闻一则,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。总理语少白曰,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,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,意义甚佳,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。”原来,“革命”还是舶来品。

我们还要指出一点:宋耀如同孙中山相识,还有 1886 年之前的说法。

宋庆龄在《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》(《党的文献》1994 年第 5 期)中说:“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时常向中国学生演讲宣传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必要。我父亲那时见到了孙中山先生,他们成了好朋友并一起旅行。”

张珏在《在宋庆龄像前的回忆》(1994 年)中也这样写道:宋庆龄说,她父亲宋嘉树(又名耀如和查理)青年时代在美国结识孙中山。“在美国,孙逸仙先生正向学生演讲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必要。父亲和他相遇了,一起旅游。”宋耀如回国后,“在住宅后面设印刷厂,印宗教册子。同时也印秘密革命册子。那时我们都在童年。父母嘱咐,不可告诉任何人并禁止带出革命册子。父亲以后也在经济上援助孙先生。”“儿童时代我们就知道革命的故事。那时候称他们为‘长毛’。因此我在美国时十分渴望来自祖国的消息。”

孙中山于 1879 年赴檀香山读书,此时的檀香山尚未隶属于美国,且与美国距离遥远,之后他又相继在广州、香港等地学医。而宋耀如自 1878 年到美国,再到 1886 年初回到国内(上海)之前,一直在美国学习和生活,从未到过别处。可见,孙宋二人在 1886 年之前的活动轨迹无任何交叉之处,宋庆龄此说与实际不符,应是误记。[图]

『革命童子』冯自由在所著的《革命逸史》中记载孙宋一八九四年初识于上海。图为冯自由(左)与孙中山合照。